

创业学院,你的未来是什么模样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7年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团委成立了创业学院,当时不少人问该校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汉慧:“你们创业学院究竟是虚的,还是实的?”

不少教师对这个问题非常纠结。因为依据传统的思维,一个学院如果没有学科就是虚拟的,无论学院是否有场地、独立的资金、专门的行政人员、教师。所以,邓汉慧当时回答他们:“我们是半虚半实的。”

教师们的纠结也促使邓汉慧去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创业学院应该是怎样?

不久前,首届全国高校创业教育学院院长论坛在京举办,上述问题不仅仅是该论坛的话题焦点,也是诸多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

脱离专业办教育

在如火如荼的创业政策推动下,“创业学院”这一名词对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成为全面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标志。同年8月,浙江省教育厅出台政策,明确要求在全省高校普遍建立创业学院。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有101所高校建立了创业学院。全国范围内相当一部分高校也陆续开办了创业学院。

而“脱离专业该如何办教育?”这一创业学院“第一问”,无疑让很多人倍感迷茫。有如此强势的政策推动,成立相关的学科点真的有那么难吗?

采访中,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李家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相比较国外高校,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实践起步晚,积累不足,这也会导致创业教育要慢一程。在学科建设上,国外一些高校设有创业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方向。而我国的创业教育目前主要是进行通识素质教育,在走向专业学科的道路上还异常艰难。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如何把创新创业纳入学科专业教育,目前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现有某一学科的二级学科,二是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和专业方向。

“无论是把创业归于教育学,还是管理学、经济学,都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范式。”黑龙江大学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玉峰说。这无疑也是制约创新创业纳入专业教育的最大障碍。

“创业学倘若仅作为专业方向而不形成独立的学科,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李家华补充道,“事实上,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创业学的基本问题。”

他以管理学为例解释,一般认为工商管理专业与创业学最为接近,但实际上管理学关注解决的主要是业已存在的问题,即1至n;创业学则主要关注解决的是未知的问题,即0至1。管理基于产品、员工、工厂等相对确定的要素,而创业则面对的是资金、市场、团队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其基本研究方法、思维方式都有较大差别。而且,

现有工商管理理论大多来自国外,由于存在文化和国情差异,恐难准确且有深度地解释中国今天迅速崛起和规模宏大的创业实践。

两张皮致教育异化

实践积累不足,理论体系缺乏之外,限制创业教育的一大桎梏,来自于创业教育与现有学科不能完全融合。

“创业学院没有专业,那就意味着专业教师进不来。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两张皮,专业教师搞专业,创业做得再热火朝天,专业教师也不理解。”邓汉慧说,更何况,创业是市场化行为,而办学院是教育行为,运作方式本身就不一样。

当下,创业教育模式同质化是高校一大通病。比如,在课程开设、教学方法和实践范式等方面,国内创业学院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尤其是过度热衷大赛活动,追求短期效果,组建种类繁多的联盟等,都导致创业模式的趋同,这都是不利于创业教育健康发展的现象。因为“每一所高校的学科特色不一样,没有专业与创业的结合,创业项目也将失去核心竞争力。”邓汉慧说。

甚至于没有专业教育的加入,创业教育也会走向异化,一些创业学院将办教育变成了开公司,建孵化器、商业实体。邓汉慧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创业学院大量兴建高楼、做孵化器,把资金、场地都准备好了,但是突然回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学生项目不行、级别达不到。这不禁让人哭笑不得。

尽管有一句话说“让老师教创业还不如让企业家来教”,但大学事实上小心翼翼地与企业保持着一定距离。

原因并不复杂,简单地说“怕被企业带偏了”。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葛建新对此

有着两重担心:一重担心来自于教学内容、合作模式无法很好把控,企业侧重现象、故事描述,学院强调案例背后的知识点;另一重担心在于没有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摸不清对方的动机。

“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介入教育,往往容易把创业学院做成商业机构。然而,一些高校并没有分清教育与非教育的界限,大学真正要坚守的是立德树人、培育人才,而不是做商业项目,项目是手段,把手段变为目的必然会把教育导入误区。”李家华说。

摸着石头过河

“先盖了一座庙,但念什么经还不知道。”用来形容创业学院的诞生,也许并不为过,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本土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创业浪潮。第一次创业浪潮是农民成立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浪潮是机关干部下海,第三次创业浪潮是海归回国创业,第四次创业浪潮则是大学生创业的崛起。显然,我国创业发展的特色正是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学科专业的前面。”李家华说。

颇有“摸着石头过河”味道的创业学院,在此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

尽管官方推介的模式是在教务处下成立创业学院、创业中心,落实教育部规定的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但除此之外,更多的情况则是,创业学院有的由就业指导中心、有的由团委、有的由商学院成立。“由此带来的条块化、碎片化的问题,也使得创业教育之路越走越窄。”邓汉慧说。

所谓条块化、碎片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打游击”,缺乏系统性。李家华解释,有的学校主张以赛促教,而有能力牵头组织大赛的团

委,便成为创业学院的成立单位;有的学校强调学科牵头,就发展学院,它的好处在于有学生优势,但动员力不如团委强(动员本专业学生尚可,但动员外专业学生不如团委、教务处、学工部牵头也存在同样问题)。“大家的纠结之处在于,在画地为牢的模式下,究竟是我来管还是你来管,资源、利益分不清楚。”

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模式下的一种操作,因为“创业不能只有一种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高校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就必须允许它有多种方式的探索。

在刘玉峰看来,创业教育是要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管理全链条,还是分解在教务处、团委、学工部,高校都可以尝试。

“高校在实际中走出来的形式很多,比如四川大学的后端孵化做得好,但并没有成立创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创业学院由团委牵头,效果也很不错。”在论坛上,刘玉峰如是说。

未来走向何方

未来的创业学院究竟是什么模样?

李家华认为,“叫创业学院还是创业中心并不重要,未来的发展不一定是由某一部部门牵头,而是要做成一个校级的创新创业大平台。专业院系推动专业学科建设,团委、学生处发挥动员学生和组织实践活动的优势,科研处负责对接产学研项目,教务处主抓课堂教学等。由此形成一个开环模式,有效导入政府、社会、企业和学校资源,吸引师生踊跃参与其中。”

在他看来,其难点在于做好顶层设计。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在十九大后提出,要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赋予创新创业教育战略意义。

“创新创业教育不属于某个专业、部门的问题,不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补充,而应在顶层设计层面把它纳入基础型、战略型的教育格局,列入人才培养系统,建立创新创业的大教育观。”李家华说。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教学体系也将被颠覆。创业以学生为中心,创业教育会打破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

“要让学生学会游泳,就要让他们下到水里去,与此同时,教师也应下水游泳。”李家华打了个比方。那么,对于教师能不能创业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教师应该参与创业项目和创业实践,和学生一起学习创业,而不再是传统的你教我学的定位。教师可以不是游泳冠军,但必须‘懂水性’。创业指导教师的角色由此可以转变为陪伴者、引导者、激发者,这是未来创业教育提高质量的核心点。”

未来的创业学院升级应围绕学生,邓汉慧对此表示肯定。“当下一些创业学院变成了精英班,想创业的进来,不想创业的勿扰。而实际上,创业教育是一种素质培养,培养的是学生识别机会、整合资源、团队组建等能力。互联网时代下的不确定性所需要的能力已远远超出一般技能,创业学院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培养高度不确定性下的应对能力、适应能力,甚至能够创新创业的能力。”

现场

“一带一路”上的校企对话

——首届“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陈彬

2017年底,一份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正式对外公布。这份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达到1961.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已经超过3万家,足迹遍及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海外投资步伐之快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一个问题也就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我们的人才够用吗?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该报告发布不到一个月后,2017年12月22日,由江苏大学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在该校拉开了帷幕。在这场论坛上,来自高校、政府和企业的专家所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便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人才能否适应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对此,他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找不到的“总经理”

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南南合作促进会会长、外交部原副部长吕新华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为此,他所在的南南合作促进会还专门成立了一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然而,时至今日,这家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却依然空缺席。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国外经商经验、懂得国际商务规则、英文熟练的人士担任这一职位。为此,我们甚至开出了百万年薪,但仍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在论坛的发言中,吕新华说。

不久前,一家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分公司的浙江企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担任分公司总经理,希望南促会能帮他们推荐一个人选。这

让吕新华很有些哭笑不得:“我们自己的总经理还找不到呢……”

人才难求,这成为了很多与会者的心声。

对此,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在发言中表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说到底是人與人之间的交往。推进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急需大批具有跨文化胜任能力的人才。“我们在培养熟悉国际规则、擅长国际交流的‘外国通’的同时,也要协助沿线国家培养更多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道路和熟悉中国标准的‘中国通’,不仅要扩大国际人才培养规模、提升培养质量,也要深刻把握市场和企业的对人才的需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他说。

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内高校应该作哪些改变呢?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在此次论坛召开的几天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看来,这份《意见》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的基础就是科技和人才。”陈锋说,在产业链中间,怎样把创新的要素加进去,也就是把科技和人才要素加进去,就要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产业链相结合,而这就必然要改变高校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事实上,当前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的确不适合新型人才的培养。

“当前国内高校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只是将现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从知识到

课堂的模式,已经决定了人才的落伍,对于高校来说,这就是核心的挑战。”陈锋说,而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几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在这次论坛上,江苏大学“一带一路”校企合作国际人才实践基地正式揭牌成立,多家企业现场与江苏大学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而早在一年前,江苏大学还联合国内近百家企业,成立了国内首个“1+N”类型的校企合作联盟——“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研联盟”。通过国际人才培养产学研联盟抱团“出海”的形式,将学校、企业等市场主体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结,形成生源链、产业链、师资链、就业链的全线畅通。

“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作为高端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关键是需要有国际视野、懂商务、懂外语、了解当地文化习俗的复合型人才。而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我们的高校认真思考。”吕新华说。

极其重要的“外来”资源

作为我国地板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安信伟光地板有限公司早在十几年前,便已经将自己的企业设在了万里之遥的巴西,而在巴西建厂之初,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翻译人员就成为为了公司董事长兼CEO卢伟光最头疼的一件事。几经寻找,他们最终在一个不大的中餐馆里,找到了老华侨。“中文不是特别好,但能找一个翻译,我们就已经欣喜若狂了。”在交流中,卢伟光回忆说。



首届“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发展论坛现场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当卢伟光将企业发展的步伐踏入非洲时,如何培养一批熟悉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便成为了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正因此,早在2014年,安信伟光地板有限公司便在江苏大学设立专门的留学教育基金,以此鼓励来华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更加热爱中国。

应该说,近年来大型企业联合国内高校,在校设立留学生奖学金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且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对此,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王胜刚表达了欣喜之情。“企业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立足可能是当前,却也有着长远意义。”他说,必须承认,解决走出去企业的人才短缺问题,必须以本地人才为主,但外国在华留学生也是极其重要的资源。

2016年,我国共招收外国来华留学生44万人,2017年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在王胜刚看来,这些资源是国内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最优质资源。而当企业愈加重视这份资源的时候,如何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留学生,则成为了国内高校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梁凤池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来华留学生质量评估体系,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质量就是生命线,通过建立控制与服务、监督与建设于一体的内部质量体系,切实将日常教育实践转变为质量保障行动,真正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建设的捍卫者和行动者。”他说。

中国大学评论

“专业类国标”的全称是“普通高本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7年12月6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徐青森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2个专业类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将很快公布。为此,笔者特别在《中国科学报》撰文——《推出“专业类国标”需要格外谨慎》(见本报2017年12月12日第5版),提出“专业类国标”很可能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造成阻碍,建议将“专业类国标”悬搁起来。文章在业界引发了讨论,为此特别需要对其中的核心问题予以深入阐发。

2014年4月16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曾在北京召开过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工作会议。该会议纪要中指出,“国标”要力争成为专业准入标准、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评价标准,若有困难,也要成为专业准入标准和建设标准,最低要求是作为专业准入标准;准入标准中应有一定的定量指标;“国标”,应根据专业类建设现状、专业改革要求以及国际通行标准确定课程体系。徐青森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专业类国标”明确了各个专业建设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底线要求,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都有详细和明确规定;明确了底线要求为下一步开展专业建设、组织专业评估,提高教学水平、推进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专业类国标”的核心本质,非常类似某种升高的“底线”。那么,我们能否通过设置一个“专业类国标”去进行课程和课程体系设计,进行专业建设、专业评估以提高教育质量呢?这其实是课程论中一个基本问题。英国学者斯腾豪斯(L.Stenhouse)就曾对类似的“目标模式”有所批判。斯腾豪斯提出一个简洁的比喻就迅速呈现出逻辑漏洞:目标模式的方法期待通过将目标明晰化以改善教育实践,这一点类似于在田径场跳高比赛中,将横杆升高以期提高运动员的跳高水平。

简单地提高横杆升高了,运动员的跳高水平就自然会提高吗?

设置“专业类国标”以期提高教育质量的努力,不但难以经逻辑拷问,在实践中也难以产生真实效果。“专业类国标”是提高了的“底线”,假设我们公布了“专业类国标”,那么在“底线”提升的十几年内,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其实都很难迅速提升,这意味着中国高等学校每年会有比以前更多的学生难以按时毕业。在高校工作,很快就知道这根本不会发生。目前大数据已经广泛用于教育决策,只要我们统计和公布高校四年的本科学位率/毕业率,马上就可以验证以上假设的真伪。

斯腾豪斯对与“专业类国标”类似的“目标模式”展开的第二角度的批判,其出发点是知识的本质。“专业类国标”可能误解了知识的本质,将知识当成了确定的“知识”。

“专业类国标”可能在训练行为技能为主的类专业类中适用,例如高职专业,例如本科中的军事类专业和工学类专业、医学类专业等。但从知识论角度仔细推敲,“专业类国标”适用于以上领域其实存在前提。只有当这个职业领域处在范式稳定期,知识和技术非常稳定的时候,“专业类国标”才可能适用。在当下技术迅速变化和进步的时代,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持续出现的时代,对“专业类国标”特别需要有所警惕。以工学类专业为例,假设一名学生按照“专业类国标”的要求,把感光材料相关专业的知识学得很好,掌握扎实,毕业后被这一领域世界最好的柯达公司录用,今天他是否还在柯达公司如鱼得水地工作呢?假设一名学生按照“专业类国标”的要求,把汽车发动机的原理精准地掌握,对汽车机械技术非常精通,2040年他的职业前途如何呢?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已经立法,2040年禁止销售汽油动力汽车,中国由于雾霾严重,类似立法并不会太远。内燃机已然时日无多。在比亚迪、特斯拉之后,2017年12月,纯电动汽车蔚来汽车也上市了……最近几年内,考生如果报考还没有意识到风险的汽车和传统机械类专业,很可能面临着中年失业,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选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教司提出的新工科概念才被高教界广泛和迅速地认可,相关改革和实践已然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概念把握住了时代潮流和变化的本质。新工科不是朝向所谓确定的知识和标准,而是朝向创造力,朝向不确定的知识和未来。

与职业类专业不同,在以学科为划分标准的专业中,包括单一学科专业、跨学科专业和问题为中心的专业,知识的本质更加凸显其不确定性。这些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将学生导向与“确定知识”相反的不确定性,与“确定知识”相反的创造性。斯腾豪斯说:“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引入作为人类思维系统的文化知识,增进了人的自由。知识形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人们可以用它思维。与信息不同,人由此进入了知识的本质,这一本质是一个支持创造性思维,并为判断提供框架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成功的程度是它所导致的学生不可预期的行为结果增加的程度”。“不可预期的行为”就是创造性,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专业类国标”是形式化的质量标准,其逻辑基础基于对“知识”本质的误解,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可以预期的行为结果”增加,这显然不是创造性,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工科人才,不是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看,“专业类国标”表面上似乎提升了“底线”,但却在逻辑上实实在在地拉低标准。拉低的标准如何能够被冠名以“中国”的“国家”标准呢?“专业类国标”研制已久,教育部一直没有推出,这是谨慎和格外富有智慧的态度。再次诚挚建议教育部以古老的智慧,将“专业类国标”继续悬搁起来。

在2018年的开始,我们是否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未来已来,唯变不变”?

(作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专业类国标」再反思

卢晓东